



# 《唐书志传》中李世民的艺术形象

## 探索

**The Character of Li Shi Min in Tang Shu Zhi Zhuan**

胡翠欣

**OW CHOOI XIN**

**16ALB0322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0**



# 《唐书志传》中李世民的藝術形象

## 探索

**The Character of Li Shi Min in Tang Shu Zhi Zhuan**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意义.....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
第四节 研究难题.....	7
第五节 论文架构.....	8
第二章 李世民的神化形象.....	10
第一节 龙的化身.....	10
第二节 神话历史化.....	12
第三节 “极近人之笔”的铺垫.....	15
第三章 李世民形象中的“谏”.....	18
第一节 虚心纳谏的帝王.....	19
第二节 设谏以教化.....	21
第三节 个性化语言.....	24
第四章 反面形象的正面作用.....	28

第一节 轻率自负的负面形象.....	28
第二节 元代历史剧的影响.....	30
第三节 反面技法.....	32
第五章 结语.....	36
引用书目.....	38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  
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胡翠欣 OW CHOOI XIN

学号：16ALB03229

日期：2020年9月17日

论文题目：《唐书志传》李世民艺术形象的探索

学生姓名：胡翠欣 OW CHOOI XIN

指导老师：林志敏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在明代深受读者喜爱，但现今学者却认为这部小说文学艺术价值不高，因此本论文试以《唐书志传》中李世民的藝術形象探索作为研究角度，志在发掘这部小说隐藏的文学艺术价值。本论文引用历史社会批评法和人物技法论解析当中李世民的藝術形象，发现作者熊大木受到了史官文化或史官笔法影响，将李世民神化成“龙”，并借着“极近人之笔”的手法将他塑造成亦神亦人的帝王形象。李世民纳谏如流的形象则是在作者注重小说的社会价值之观念下，呈现出强烈的教化思想，并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使该形象坚定得不可撼动。作者也在元代隋唐历史剧的影响下，刻画出了李世民的各種负面形象，其目的在于借此反衬李世民虚心纳谏的主要形象。最后总结出李世民在文学中的藝術形象有别于史书上的历史形象，前者更多利用了丰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李世民多样化的形象，从而造就了这部小说的文学魅力。

关键词：李世民、《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唐书志传》、艺术形象

## 致谢

首先，我想感谢我父母在四年前尊重我的选择，让我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报读中文系。因为有他们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我才度过了四年充实美好的大学生涯，完成我的学士学位，也顺利完成了这篇论文。尤其是在我忙着准备论文只能偶尔回家的期间，母亲担心我在外吃饭没能摄取足够的营养，总是在我回家时准备好一桌的好菜等着我，只希望我能在忙碌期间也能照顾好健康。这份爱与关怀，铭记于心。

接下来，我想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林志敏老师。尤其是准备论文期间不幸碰上了疫情，为了确保老师学生的安全只能改换成线上授课和讨论，还有前期图书馆的暂不开放也为论文的进度带来不少阻碍。尽管如此，老师仍每个星期抽空关心我的论文进度，提醒我纠正论文的错处并且提供更好的建议，让我能够把论文修改得更好。最终能够顺利完成论文也是多亏了老师的帮助，谢谢林老师。

还有感谢身边的朋友们，总是在我有些颓废时狠狠鞭策我，督促我，这份论文能够顺利产下也有他们部分的功劳。最后，感谢自己尽管在这过程中疲惫迷茫过，却不曾放弃前进的脚步。我相信有多少努力就会收获多少成果，手中这份妥妥 1 万 9000 余字的毕业论文就是最好的答案，希望未来自己也能保持这份精神，继续前进！



# 第一章 绪论

中国各朝都有其代表性的文学，正如王国维所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sup>1</sup>，虽未提及明朝的代表文学，但笔者认为“小说”当之无愧，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文体形态的成熟，更让明之小说达至巅峰。明代从嘉靖年间开始的政治内斗导致思想文化统治松懈崩溃，民间文人在文艺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再加上印刷业的逐渐发达和百姓经济能力的提升，这些种种因素都促使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诞生。

当历史演义小说开始被广大读者所接受时，市面上有限的历史演义题材逐渐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明代的书坊主敏锐地察觉到该现象，于是他们“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促使着书坊主从小说流通环节越位到了小说创作领域”<sup>2</sup>，书坊主熊大木所著的《唐书志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熊大木看准了市面上演义小说创作的贫瘠，于是亲自投入创作，借着出版更多演义小说增加小说销量，典型的商人思维。

《唐书志传》也如一般的历史演义小说，可从其内容特点上看出融合了正史、平话与传说。例如以史书惯用的编年体体例，在章节中插入“话说”、“且说”及“且看后节如何分解”之类的平话话语。同时，还加入神化李世民

---

<sup>1</sup>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页7。

<sup>2</sup> 张兴国，〈明代书坊主熊大木、余象斗小说创作比较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页9。

为腾云驾雾的龙等虚构写法，将《唐书志传》在历史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故事性，使之显得惊险刺激又抓住人心。职是之故，本文要旨以发掘《唐书志传》中的文学独特性为主要考量，力求探测其文学艺术价值。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意义

在早期所创的历史演义小说当中，仅次于《三国志演义》而广受读者喜爱的小说，当属明代熊大木所著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简称《唐书志传》，另有别称《唐书演义》。《唐书志传》最早的版本刊刻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内容描述唐朝的开国事迹，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延续至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全书重心以围绕李世民为主描述其丰功伟绩。据韩锡铎，王清原的《小说书坊录》记载，明代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被翻刻了近四十次，《唐书志传》也有近十次，其他历史演义小说如《英烈传》、《列国志传》等则有约八、九次<sup>3</sup>，这说明《唐书志传》在当时民间的流传与接受度仅次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如此，因为许多小说家都投入创作，《唐书志传》在小说市场更出现多种刊本，除了最初的刊本，嘉靖三十二年的杨氏清江堂刊本之外，还有万历二十一年的唐氏世德堂刊本，余氏三台馆刊本及万历四十八年的武林藏珠馆刊本。<sup>4</sup>由此可见其在明代小说界的影响力。

---

<sup>3</sup> 韩锡铎，王清原，《小说书坊录》，转引自：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27。

<sup>4</sup>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页48。

然而，让人疑惑的是这样一部在明代广受欢迎的小说，在现今学术界小说研究中却稍显冷门，且学者对其在文学的成就上也显得反应冷淡。其中，学者石昌渝认为这部小说“无驾驳纷繁事状的笔力，而演义生发，则又无艺术想象的才气，弄得不雅不俗”<sup>5</sup>。另有纪德君表示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外，其他演义包括《唐书志传》都显得“质实寡味，缺乏文学意趣”<sup>6</sup>。李保均同样在《明清小说比较研究》中表示此书“艺术成就不高”<sup>7</sup>。

看来明代《唐书志传》的流传程度与现今学者对其评价有明显的落差，不由得让笔者有一辨孰是孰非之心。尤其是学者们认为该小说内容多参照古史导致失去了文学的情致，更让笔者好奇这部小说是否真的毫无文学艺术内涵，还是说当中尚有未被挖掘，值得被文学理论所探讨的文学潜在价值？例如《三国演义》同样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就受到了正面肯定，许多学者透过分析当中的叙事模式、英雄或反派人物的形象规律、或是人物的描写手法等等，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可钻研的小说观点和理论。反观《唐书志传》的文学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学者们大多都把研究焦点放在了小说的虚实观，考据这部小说有多少借鉴真实历史成分，忽略了从文学角度重新看待这部作品。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志在从《唐书志传》有限的文学研究成果上，开拓出新的视角，不仅从文学角度细致地探索小说中的人物艺术形象，还运用文学理论探测其中的人物创作手法。简而言之，笔者将以杨氏清江堂刊本的《唐书志传》为研究对象，研究小说中李世民的明君形象如何被塑造，同时探讨形象如此被塑造的原因和塑造李世民

---

<sup>5</sup>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页214。

<sup>6</sup> 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页179。

<sup>7</sup> 李保均，《明清小说比较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82。

形象时使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希望这篇论文能够为《唐书志传》带来一个新的文学研究方向，为学界尽点绵薄之力。

## 第二节 前人研究

学术界中探讨《唐书志传》的论著不多，但仍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这部小说并且研究了其价值之处。中国学者纪德君所著的《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结合了叙事学、心理学与文化学论述明清之际的历史演义小说，以结构手法将《唐书志传》列入通鉴式朝代编年体一类。纪德君提出其观点将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明君形象包括李世民皆称为“刘备式”的系列明君形象。书中论述了明君的性格行为背后隐含着的文化心理因素，以及注入传统文化和读者理想对明君形象的影响，将演义小说中的明君解析为“汉民族君道观的形象体现”及“民众圣君理想的表意符号”<sup>8</sup>。此外，纪德君的《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也对明清通俗小说包括历史演义小说进行多维度的考察，如作者的生平背景和身份，还有读者的身份阶层和品味。这些都利于思考这些因素是否影响《唐书志传》中人物塑造的最终成果。

与纪德君不同的是，孙一珍所著《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的分类以内容为准，将之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叙述一朝一代从兴起至灭亡全过程的全豹型演义小说，以及只展开某个朝代开国奠基的全历程的一斑型演义小说。针对小说人物在历史与战争事件中的动态表现，该学者认为成功营造了

---

<sup>8</sup> 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页 230。

人物形象的艺术效果和美感。《唐书志传》里的李世民不仅塑造为谋略与胆识兼备，重贤纳谏、审时度势，同时也刻画出其内心矛盾。

另外，刘雪所著的硕士论文《论隋唐故事中对李世民形象的演变》里总结出，怀着不同目的所塑造出来的不同形象，致使最后带出的艺术审美价值也随之有变。例如在研究《唐书志传》中的李世民时，指出相对于体现治国的仁义，小说更多渲染了在军事战争上李世民“勇”的特质。其他作品如诸圣邻作于万历年间的《大唐秦王词话》，体现出李世民从主角地位沦为配角的情况。同样是历史演义为题材，由齐东野人作于崇祯四年的《隋炀帝艳史》中的李世民在描述与武则天的情感情节时突显了好色的形象。纵观而言，刘雪对深度研究和比较不同小说中题材与时代因素对李世民的形像建构和审美价值追求的影响提供了精细的分析和见解。

大略总结上述的前人研究结果，纪德君虽然指出了历史社会因素如作者生平背景及读者所处的阶层和品味会影响小说中贤君形象的创作走向，但却未深入触及这些因素是否也会影响到建构形像时所选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或表现形式。孙一珍精确地总结了《唐书志传》里李世民运筹帷幄、重贤纳谏、审时度势的形像，也察觉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矛盾。然而该研究却仅是蜻蜓点水般浅探，若是结合文学理论一一剖析之，想必会对《唐书志传》里李世民艺术形像的独特性有新的发现。至于刘雪提出的抱持不同目的创作出不同形像，进而导致不同艺术效果的观点正好为笔者这篇论文开了个好头，因此笔者将会在学者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延伸出以文学理论为依据探讨《唐书志传》中李世民形像与众不同之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人物形象的建构对一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体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分析形象建构的最终形态之前，首先必须了解时代风气与作者的主观思想对人物创作的影响。学者王先霈也强调：“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sup>9</sup>，尤其《唐书志传》本就是在明代政治氛围、经济崛起、史学和文学的交汇等各种因素碰撞下的产物，因此笔者将使用社会历史批评法考究书中李世民形象背后所反映的讯息。社会历史批评法的特点在于考察作者生活的时代、文化、环境和当时的文学思潮是否制约了文学的创作，以及通过作品当中的人物善恶之分或结构编排等，看出作者的主观思想情感和艺术理念。同时，该批评法也注重文学的社会实用价值。笔者在第一章里，从中国的史官文化背景下手，探究李世民的龙形象如何成为读者心中理想圣君的代表。第二章中李世民纳谏之形象，主要通过带出作者的理念寄托和作者对小说社会价值的注重，联系至纳谏形象的教化作用。第三章则是阐述明代的文学创作环境如何影响了作者的编创想法，从而塑造出李世民的负面形象，唯有将小说摆入历史社会背景去拼凑出他的全貌，才能掌握当中李世民形象所带出的意义。

另外，人物形象的建构不可避免会使用到塑造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主张小说作品的主要魅力在于塑造出成功且充满个性的人物形象<sup>10</sup>，那么形象的表现手法就是带出小说魅力的重要手段。因此，笔者也将

---

<sup>9</sup>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71。

<sup>10</sup> 陈洪，《中小说理论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页169。

以小说技法学当中的人物技法论——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来分析李世民形象中的艺术价值。小说技法简单来说就是“小说创作中的具体艺术手法”<sup>11</sup>，当中包括刻画人物的人物技法论、解析情节构思的情节技法论，以及总结叙述模式的叙事技法论，而本论文主要着重以人物技法论探讨李世民形象的刻画方式。例如，第一章中剖析作者如何运用“极近人之笔”手法带动李世民的神化形象，第二章中讨论如何运用语言个性化的方式突显李世民虚心纳谏之形象以及第三章则是叙述作者利用反写手法，让李世民的负面形象反衬了他的主要正面形象。

#### 第四节 研究难题

在撰写论文时，笔者面对的难题主要是在收集资料方面，学者们对《唐书志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据小说中沿用了多少史书成分，或研究小说作者的虚实观，至于像是在前人研究提及的有关小说人物文学价值方面的研究可说是寥寥无几。这意味着笔者在研究《唐书志传》中李世民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时不能只依靠前人有限的成果，而是必须经过对文本的详细且多次阅读，然后摘出文中李世民较突出的形象特征。之后，再寻找相关的小说人物理论来分析作者对李世民形象的创作方式以及为笔者的观点佐证。

资料的有限和对小说文本重复再重复的翻阅对证，还导致了前期论文准备工作的时间过长，论文撰写的时间变得更加紧迫。幸好在马不停蹄地追赶进度下，还是顺利在限时内完成论文。此外，笔者在进行《唐书志传》李世民形象

---

<sup>11</sup>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页 927。

研究时面对的另一挑战是，阅读小说中遇到无法理解的文言文而不能顺利了解故事内容。因为了解故事情节才能良好地掌握李世民在文中表现出的形象特征和内在性格，所以艰涩的文言文就成了掌握李世民形象的障碍，也拖延了论文的完成进度。于是，笔者唯有时刻上网查找古文词汇的白话含义，明白情节的发展过程才能继续进行论文的研究和撰写。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笔者的这篇论文主要探索《唐书志传》里塑造出的李世民形象。本论文将分成好几章深入讨论世民的各形象，第一章绪论分为以下几节，分别是研究动机与意义、前人研究、研究方法、研究难题和论文架构。

论文的第二章首先将会阐述李世民在小说里被塑造成“龙的化身”的神化形象，而神化的形象建构在历史追溯下可发现其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官文化有所关联。作者便是利用该史官文化对读者的心理影响神化李世民，并且以合乎人情的“极近人之笔”人物刻画技法为神化李世民的叙述铺垫，增加他神化形象的可信度。

第三章〈李世民形象中的“谏”〉剖析李世民在小说里作为虚心纳谏的帝王有何表现，从中揭露作者创作该形象的目的在于教化读者，让读者借着他虚心纳谏的行为有所思有所感。笔者还发现了作者在李世民的劝谏对话里使用了个性化的语言让他虚心纳谏的形象更加还原逼真。当该形象可信得足以触动读者，教化的效果也就随之增加。



第四章将会发掘李世民在小说中的负面形象和性格上的缺点，以及元代历史剧的影响是如何渗透到这部小说从而左右了作者对李世民形象的塑造。同时，笔者也在这章节里阐明作者如何使用反写的手法烘托出李世民的主要性格和形象，将他打造成一位富有感情，形象饱满的帝王。

最后结语则是总结前三章李世民在小说中被塑造的形象，以及作者在建构世民形象时使用的人物技法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以回应笔者提出的问题意识。

## 第二章 李世民的神化形象

随着明代社会风气的逐渐开放和文学创作空间的放宽，通俗小说的产量越来越多，作者创作小说的手法也变得五花八门，而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作者纷纷基于历史事迹上融入丰富的想象力使小说内容更精彩。《唐书志传》亦不例外，当中李世民的形象便是以艺术的虚构神化成异于常人的帝王，为小说增添了神秘奇幻的色彩。

### 第一节 龙的化身

李世民在《唐书志传》的最开端早已暗示了他出身不凡，其作为由天授命，威武之帝王的身后似乎还掩盖着一层朦胧的面纱，等待读者揭晓当中的答案。作者在第一节的《诸将佐具陈智略，李世民倡议起兵》中开始埋下第一个伏笔：当有神秘书生见到四岁的他后说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遇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sup>12</sup>。李渊担心书生将此话泄露出去，便找人追杀，却不知书生所踪，于是“因以为神，乃采其语，名之曰世民”<sup>13</sup>。这里就用了预言的方式暗示李世民是龙凤之转世，日后将登上帝王的命运。

---

<sup>12</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卷1，页1。

<sup>13</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1，页1。

往下第十二节的《王世充金墉大战，李世民东都解围》里，刚替东都越王退下李密十万大军的建成和李世民进城拜见，只见越王唯独对李世民格外欣赏，“越王视世民，龙行虎步，有帝王相，深礼重之”<sup>14</sup>。此时的他号令的军队气势强盛，还有裴寂、刘文静、殷开山等一众能干的部下谋臣相随，言行举止上可见“龙行虎步”，初具王者风范。

以上仅是简单带过世民的王者气质，可在第十九节的《唐高祖徵徐世勣，尧君素射李氏妻》中，他的帝王风范已有了更加具体生动的描述。温彦博劝幽州守镇者罗艺归顺于唐时说道：“吾闻唐主李渊，其子秦王世民，有尧舜之仁，禹、汤之德，温恭而履度，宽裕而养冲。如玉韞石，虹霓凭乎山川，及云升天，龙泽沛乎宇宙。神民悦豫，内外服宁。诚治世拨乱之主也”<sup>15</sup>。李世民的仁慈和美德被比作成尧舜和禹汤一般，即是将其地位提升至和神话中的圣贤相平等，身怀气吞山河般的龙泽君临天下，是个神也认可的天选之人。另外更要注意的是，这三个例子中作者都用了“龙”来比喻他，这一切并非巧合，而是为了后续将他直接神化成龙的化身而安排好的层层铺垫。

第三十三节的《美良川铜鞭逞战，三跳涧勒马飞度》中，李世民被尉迟敬德追杀，策马奔至美良川，前有数丈阔的深涧，后有敬德追杀，只见他仰天呼喊“世民若是有天子之分，此玉鬃马一跳而过；若无其分，连人带马落涧而亡”，然后“世民尽力着鞭，那马一跃飞过霓涧”<sup>16</sup>，说明上天对他的眷顾。不止如此，后面的描述更是超出现实，当敬德赶上李世民，欲抽鞭打向他时，头上铁盔却龟裂，让敬德猛顿下，思索道：“昔日送我之人，曾道此盔出于异制。

---

<sup>14</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2，页52。

<sup>15</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2，页87。

<sup>16</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4，页160。

久遇圣君，必有剥落之应。吾未深信。今日恰好诚如彼言。莫非此人后当有天子福分。为吾真主乎？”，“遂睁开环眼，见秦王背上紫雾腾腾，红光闪烁，火云中不见秦王，却现一条怪物，牛头蛇体，蟹眼虾须，鱼鳞兽角，八爪拿云，曾在沧溟戏浪，却来坡上喷烟”<sup>17</sup>。敬德面前的李世民不见了，出现的却是充满气势吞云吐雾的蛟龙，叙述中龙的外形特征也被刻画地十分立体生动，仿佛跃在眼前。此处已实现之前例子中的暗示和比喻，直接明示他便是龙的化身或转世，因此才会幻化成龙，待他陷入危机时释放出超乎自然的能力庇佑他渡过难关。同时他又是天授命降下世间，得天眷顾同时秉着仁义和威严成为帝王统领天下，塑造了如神般至高无上的形象。这样的刻画方式让文中的李世民成为亦神亦人的帝王，读者在文字行间里也能稍微跳脱出繁多的战争和政治叙述，感受到神幻的趣味，减少审美疲劳。

## 第二节 神话历史化

小说里的英雄人物经常被作者描写的无所不能，上天遁地，甚至还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例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过人的智慧，“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sup>18</sup>，还有《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里的岳飞能来回阴间和天庭，其忠义美德的高度宣扬被神化得近乎神人。《唐书志传》里的李世民亦不例外被神化描写成了“龙的化身”。追溯回神化笔法产生的背后因素，曾雪丽便曾在其论文

---

<sup>17</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4，页160。

<sup>18</sup>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4），页110。

研究里明确揭露了神化英雄人物是源自于“传统文化中对神灵膜拜的思想”<sup>19</sup>。于是，笔者在其观点上深入挖掘，发现这种描写方式，学界里称为“神话历史化”。神话历史化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神话中的生物或传说事迹改造成现实的历史，像是尧舜作为传说人物便被改造成帝王的祖先，编入了帝王家族的谱系中。另一种则是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被神化，拥有神秘力量或超自然的出生背景，小说中的李世民便是属于这一类。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就明确指出，古代的“神性之人”或者英雄好汉，“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sup>20</sup>。司马迁在作《史记·高祖本纪》时确实记载下刘邦其母梦见神和见蛟龙游于天上而诞下刘邦，神话元素被载入正史。

神话历史化可说是从先秦时期由于史官职务的影响而造成的现象。在西周时期，史官的职务和巫祝有些相似，却又比巫祝掌管更多事宜。学者刘平和孙旭红整理出了史官的职务包括祭祀天地鬼神，推演天文历算和吉凶，以及时刻记载帝王言行和历史事件及管理文书。据两位学者的主张，史官们必须同时兼顾史官和巫祝的职务，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思维水平和记事能力的提高，他们的注意力渐渐从‘巫’转向‘史’”<sup>21</sup>。这也就意味着史官开始偏向理性，形成注重事物实用性的功利思维。

当处在讲究理性和实用性的政治社会风气下，史官们纷纷将神话传说合理地编入历史或神化帝王皇族人物，以作为政治手段使用。能够加以改编纳入正史的神话便使之雅驯，而不被接受的传说事迹则在民间口头流传或零散记载，

---

<sup>19</sup> 曾雪丽，《熊大木的小说创作与小说观念研究》（广州：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页9。

<sup>20</sup>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页8。

<sup>21</sup> 刘平、孙旭红，〈论先秦史官与神化历史化〉，《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页81。

最终形成后来的志怪叙事文。其中，神话中的“龙”便是史书中，最普遍用作为国家王权的象征，受命于天之符瑞，能够帮助巩固帝王的威严及正统性。起初在中国古代社会，“龙”作为一种神话里的图腾象征着“雷雨之神”，“握有掌握雨水之大权”<sup>22</sup>。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天气的风调雨顺决定着百姓的农作丰歉，也就等于掌握百姓的生存机会，所以当时百姓都会膜拜并且敬畏“龙”，祈求它能够带来雨水，带来农作物的丰收。于是后来的统治者为了得到百姓的拥戴敬畏和无上的政治权威，便强行把“龙”这公共图腾转移为统治者的个人图腾，通过写进史书或祭天仪式证明自己是天之子或龙的后裔。如此一来，百姓的敬畏崇拜之心也就转移到统治者身上，巩固了地位。渐渐地，神话历史化的手法在普遍使用下，成了一种文化传统。

言归小说，作者在执笔参照正史敷演情节和创作出李世民的形像时，少不了受到这样的史官心态影响，照搬此手法。尤其是小说里无可避免要提到李世民与兄弟相互残杀才换来的皇位，更是需要“龙的化身”这神化身份的助攻，来提高读者对于李世民帝王形像的说服力。出于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和熊大木的创作考量，李世民的形像被注入艺术的虚构，神化成亦神亦人的帝王。最终在其仁政治理下，征服了许多地域，使致天下归心，正好迎合了读者对理想帝王形像的期望。

---

<sup>22</sup>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遵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页 391。

### 第三节 “极近人之笔”的铺垫

由于史官笔法的影响，以及为了维护世民在小说中帝王身份的正统性，作者不得不替李世民披上一层“龙”的外衣，将他神化成自天而降的神人。然而触及到小说中的神化描写，如何达到有效的艺术虚构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金圣叹就曾在分析小说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时，反对将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过分神化。例如本是凡人却力大无穷能够飞天遁地、灵魂穿越等，这些超越常人或超自然的能力都属于过于神化的范畴。当这些英雄人物被夸张描写得超出现实超越常人时，意味着该人物“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生命”<sup>23</sup>。一般上，这些人物对读者而言都是有距离的，并且无法产生共鸣。不仅如此，小说的英雄人物被过分神化以致和反派形成压倒性的实力差距，一场对战还没开始结果已在读者心中了然时，便无法凸显出人物的英勇和胜利的获之不易。这使到该人物黯然失色，同时也失去了值得玩味和鉴赏的艺术价值。

作为《唐书志传》里主要的国家英雄人物，李世民虽然也被神化成龙的化身，但经笔者深入细读后发现，作者对其形象并非一味地、做作地神化，而是引用了一种“极近人之笔”<sup>24</sup>的描写方式为其神化叙事铺垫。所谓“极近人之笔”本出自于金圣叹对《水浒传》里“武松打虎”故事的评点。武松不过是一介凡人，因此在得知景阳冈有虎出没时第一反应是转身就走，当老虎飞扑而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sup>25</sup>。还有“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

<sup>23</sup>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台北：里仁书局，1987），页101。

<sup>24</sup> 金圣叹著，陆林辑校，《金圣叹全集（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页413。

<sup>25</sup> [明]施耐庵著，王利器校注，《水浒全传校注（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页1093。

动旦不得”，“青石上坐了半歇”<sup>26</sup>，这些又惊又怕的情感表达和肢体行为都无异于常人，合乎人情。正因如此，当武松面对无路可退生死一线时，突破常人的局限徒手打死老虎，才更能彰显出武松非凡的神勇气概。唯有写出人的情理，而非把人物夸张神化得天花乱坠，才能让读者认为人物是可信的，从而在阅读过程中带入自身情感，随人物的遭遇心情也跟着跌宕起伏。

书中的李世民需要“龙”的外衣来巩固其在读者心中帝王的正统性，但作者却没有在神化上用力过度导致带来反效果。相反的，在逐步揭晓其“龙的化身”这层身份时，运用了合乎人情的叙述铺垫，带出他常人般的思想情感和内心活动。这点可见于小说第三十三节，李世民被尉迟敬德追赶并跳涧的情节里。书中，尉迟敬德与程知节焦灼对抗时，一旁的李世民早已被其雄壮的气势和矫健的身姿惊得看呆了。为了进攻宋金刚，李世民队伍走上了尽是岩石崎岖的山路，正待他懊悔不该进入山路，队伍又遭到了宋金刚袭击。敬德从一旁窜出来对他大声吆喝，吓得他慌乱地往高坡处跑去。此处一系列的反应明显透露出李世民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完全毫无防备，乱了阵脚。叔宝赶去拦下追赶李世民的敬德，只见“秦王驻马立于高阜上看，巴不得唐军急来接应”<sup>27</sup>。他在坡上张望的举动和内心活动都说明他当下的忐忑不安和焦虑，才会恨不得唐军马上赶来支援。

随后，敬德支开秦叔宝急追李世民，逃到了相隔数丈阔的深涧，水势急促。“世民走到此，无船可渡。欲勒马复回，敬德单骑将近。世民惊慌无措，仰天呼曰……”<sup>28</sup>，从这句描述便可看出当时情势的紧张，身前是跌落便当场丧命的

---

<sup>26</sup> [明]施耐庵著，王利器校注，《水浒全传校注（三）》，页 1095。

<sup>27</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 4，页 159。

<sup>28</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 4，页 160。



深涧，身后是欲取他项上人头的敬德，李世民果真到了无路可退生死一线的险境。此时，阅读到该情节处的读者心情也会跟着悬挂起来，迫不及待想知道他的命运。接着他高呼若有天子之分便在深涧之间一跃而过，后来果真惊险跃了过去。这时读者又会产生疑问，莫非李世民真是天选之人？着急地往下看，当他奇迹般地躲过敬德的钢鞭及透过敬德的眼看到他背后环绕着的龙时，答案便已揭晓了。整篇情节安排得紧凑惊险，李世民躲避追杀的恐慌和担惊心情正符合人之情理，读者能够深深理解同时也为他的命运担忧。最后在生死刹那揭露李世民乃龙的化身，得天庇佑时，不仅让读者如释重负，也有种谜底揭晓的畅快和恍然大悟之感。假设没有了“极近人之笔”的铺垫，而是一出场便把他描写成无所不能，把敬德如同儿戏般戏耍，或许情节上就会少了悬念迭起的紧张刺激感，对读者而言也少了吸引力。

然而，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主张作者的焦点都放在了敷衍政治和战事情节上，“根本不重视人物形象，也就谈不上人物性格塑造的细致了”<sup>29</sup>。笔者认为上述以“极近人之笔”为神化身份揭露作铺垫的例子恰好解释了作者对李世民形象塑造的重视。无论是伏笔的编排、循序渐进的铺叙、人物的情绪变化还是龙的具体特征描绘，这些都只为李世民的神化形象而服务，也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和文学意趣所在，可见作者在塑造李世民形象上的别具匠心。总之，作者对世民的神化描写拿捏得可算恰当好处，符合人情之余让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再加上“龙的化身”这层护甲，正好抓住读者的心，激发出崇拜敬畏之情。

---

<sup>29</sup> 罗陈霞，〈《唐书志传》《两朝志传》的史传倾向分析〉，《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页12。

### 第三章 李世民形象中的“谏”

《唐书志传》讲述了隋朝衰败，到唐朝开创直至李世民登上皇位，创下史称“贞观之治”的天下太平现象。整篇故事中，当然少不了让隋朝和唐朝这两个朝代中最重要的的人物登场，那就是导致隋朝覆亡的隋炀帝杨广、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以及创下“贞观之治”盛况的李世民。作者对于李渊的角色并没有过多地精心描述，只是将其作为从隋朝渐渐破败到李世民正式施展治国才能之前的一个过渡角色，反倒是隋炀帝被描绘得绘声绘色的昏君形象与李世民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

隋炀帝日夜沉浸在奢靡纵欲的生活当中，身边皆是阿谀谄媚之人，也不听忠臣的劝谏反而懈怠国家正事，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最终，在国家动荡之下，隋炀帝还是逃不过被杀害的凄惨下场。有了隋朝灭亡的惨烈下场作为反面例子，作者让笔下的李世民借鉴前朝教训，树立起一个胸怀开阔、纳谏如流的帝王形象，好警惕自己不可步入隋炀帝的后尘。于是为了突出该形象，作者在创作中重点围绕着“谏”展开情节叙述，以强调“谏”的重要性。

## 第一节 虚心纳谏的帝王

文中描写了大量的劝谏场景，主要讲述李世民鼓励朝臣时刻劝谏自己，以检讨自身言行纪律，同时也劝谏臣子时刻心系国家百姓的安危。通过描写李世民广纳群臣的政见和忠言，不仅凸显出他非凡的气度，还能从他与臣子的劝谏对谈中体现出他的性情和治国之道。

作者用了许多情节设计和与朝臣对话的方式体现出李世民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以及有别于其他历史上的帝王，拥有容忍忠臣犯颜进谏的宽宏气度。“人要自见其形，必用明镜照之。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规谏”<sup>30</sup>，有了隋炀帝的下场作为借鉴，李世民深刻了解到鼓励和接纳忠臣劝谏的重要性。若是专宠谄媚奉承的佞臣只会使国家灭亡，因此他总是秉着开放心态，劝朝臣“事有得失，无惜尽言也”<sup>31</sup>。

李世民的聪颖之处就在于明白自身能力有限，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就必须有一群良臣忠臣作为明镜辅助他，时刻检讨指正自己的得失。正如第六十六节《张玄素上书谏太宗，封德彝排言斥魏徵》中，他以朝贡的使者渐多为由，打算修建洛阳宫作为游幸之用。给事中张玄素立即上书进谏，指出唐朝财力不比隋朝，却兴师动众修建奢华宫室，恐怕袭承隋朝时的弊病。他听后感叹道：“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sup>32</sup>。还有第六十七节《唐太宗避暑九成宫，张公瑾哀闻辰日哭》中李世民怀有私心，资送长乐公主的嫁妆竟倍于永嘉长公主，不合于礼。魏徵大胆进谏质问，尽管他心中已动怒，最终还是能够慎重思考，抑

<sup>30</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9。

<sup>31</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9。

<sup>32</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305。

住私情遵从于礼，恢复原有的嫁妆比例。这点说明李世民不会仗着帝王的权势为所欲为，而是利用朝臣忠直的谏言来反省纠正自己的德行，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情感之上，可谓难得的贤君。

李世民虚心接纳朝臣们的谏言，不仅展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重视，还可以从他对朝臣谏言的回应或对话中体现出他的性情和治国之道。在第五十九节《唐太宗论功封爵，孔颖达陈义讲经》中，有次他带领数百位将士宿卫在殿庭前操练射技。由于违反了御前不可佩戴刀刃的法律，群臣纷纷劝谏其“万一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sup>33</sup>。世民对此反馈道，封域之内都是他推心置腹、信任有加的子民，因此他也不会猜忌他的将士们有谋害之心。他对群臣谏言的回应正彰显了他对臣民真诚以待的心意，这份信任甚至远胜过于他对自身性命的顾虑。于是，这份信任也成功激励了将士们奋发图强，最终在数年间成为精锐的射手。

再来，李世民和朝臣的对谈言语间同样带出他公正无私的思想。某次，他于殿上亲定奖赏有功之臣，并在群臣中开放，认为封赏有不妥者可提出辨说。房玄龄便进言表示未能升官获赏的秦府旧人颇有怨言，乞求分赏给这些旧人。他理智回应道：“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可以新旧为先后哉？”<sup>34</sup>。由此可见李世民秉持公正的观念，不偏爱旧人，而是择贤才封赏，做到了对每个人一视同仁。

除此之外，李世民对朝臣谏言的采纳和反馈更是反映了他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思想。当朝中有臣子提出以重刑作为制止偷盗现象的方法时，他在此谏

---

<sup>33</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2。

<sup>34</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2。

言上给予更好的方案，说：“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sup>35</sup>。与其以刑罚作为武器来恐吓百姓，他选择了减少向百姓征收赋税，选拔廉洁的官员，如此百姓便不会被贪官欺压，也不再为了求生而去偷盗。正因为他站在为百姓着想的角度去完善政策和法律制度，最终在其治理之下社会恢复了太平安定。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描写各种朝政上的劝谏场景突显出李世民为了国家的兴盛发展，愿意虚心接纳群臣的政见和批评，并且借此端正自己的举止和德行。另一方面，借助着他与朝臣之间的劝谏内容像是军事、外交、民情、君臣之交等等，还成功带出他以诚信待人、公正无私和爱护百姓的治国理念，塑造出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帝王。这一切围绕着“谏”所体现出来的品德和修养能够让读者看清一位明君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治理好国家，具有启发读者的作用，亦就代表了小说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 第二节 设谏以教化

作者在这部演义小说的内容创作里，不管是人物的决策、对话、行动或是形象塑造上都能带出一定的义理和教训，因此虚心纳谏的形象也不例外。这样的描写让小说不再只是个娱乐消遣的工具，而是拥有饱满的思想和善恶主张，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有所启发并从中受益。有关这方面的因素，纪德君就曾说过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风气和作者本身的道德倾向是会渗透并影响小说里

---

<sup>35</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3。

抑恶扬善的思想主张。<sup>36</sup>纵观明代小说创作的氛围和其他演义小说家的创作理论，明显可见小说的价值在于起到教化民众、劝世的作用，是为了对社会和读者群有所贡献而作的。

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里作“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sup>37</sup>。这里庸愚子明确定位了演义小说的功用，即是让读者利用小说里的忠孝善恶义理对照现实，反省自身的德行规范，达到受教的效果。另外还有修髯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也指出读者阅读演义小说能“因事而悟其义”<sup>38</sup>，小说里的正邪对立有利于让读者明白英雄人物的仁义礼智信是该被效仿的，而奸贪邪恶之人则需去除以保社会太平。古时史官作史书就是为了让王者能利用前朝教训知得失正德行，如今这样的理念寄托在小说作者和评论家的巧手之下已往下转移至一般的小说，附上了教化的色彩以普及广大民众。

当明代的演义小说创作群体纷纷主张小说的教化功能时，熊大木是否亦是如此呢？熊大木所作的《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重点说到其作演义小说的原因是因为建阳书坊清白堂堂主杨涌泉挟着《精忠录》拜托他按照该内容敷衍出一部长篇演义小说，“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sup>39</sup>。熊大木也认为此书当中的史事文辞过于文缛，“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sup>40</sup>，于是同意改编写成了通俗易懂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这点便说明了熊大木创作的目的和其他演义小说创作者一样，在于将深涩史书当中的义理转换成通俗易懂的

<sup>36</sup> 纪德君，《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页 59。

<sup>37</sup> [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页 109。

<sup>38</sup> [明]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节录）〉，页 115。

<sup>39</sup> [明]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页 121。

<sup>40</sup> [明]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页 121。

文字，让文化水平较浅的普通百姓也能通过阅读小说认识其中的奥义，实现小说作为教化工具的价值。

当学者如董国炎和纪德君纷纷提出演义小说里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或正邪对抗中的劝惩教化作用时，笔者却在经过细读后发现《唐书志传》在传递教化思想的撰写方式上有别于其他演义小说，而是会根据李世民这位帝王的形象特点来决定作者背后讯息的传达方式。李世民在历史上以宽宏的心胸虚心纳谏而闻名，因此熊大木在《唐书志传》中不似其他演义小说倾尽心思在铺叙各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和战场上的华丽烟硝。他选择放大强调了李世民纳谏的特点，从小说第五十八节李世民登上皇位开始至七十七节之间，集中设计了各种他和朝臣商谈政策国事的场景和对话，除了这二十章节以外的其他章节也有较为分散地穿插着劝谏的情节。

李世民胸襟宽广、广纳贤才和忠臣的劝谏让读者能够从中领悟，唯有这样的帝王才能带领百姓创造出美好理想的社会。不仅如此，通过他和朝臣进谏之时讨论各种治国思想如去奢勤俭、严惩贪污、居安思危、济苦怜贫以及广召贤才等等，也能让读者深受启发，学习到治国的道理。于是，最终成功传递作者在小说背后欲带出的讯息，那就是作者以李世民纳谏的方式作为表达手法，教化读者的小说创作主张。

总结上述，明代小说家和评论家对演义小说社会功用的重视，让创作者包括熊大木在内都在小说里强调了阐明义理教化世人的目的。因此，熊大木便以描写李世民虚心纳谏的形象和方式带出治国之术。如此读者在阅读时不单只是

享受故事情节的转变或战事的惊心动魄，而是感受到李世民明君角色里非一般的气度，还能学习到历史知识和激发爱国思想，达到劝世教化之效。

### 第三节 个性化语言

理清了熊大木塑造李世民虚心纳谏之形象的原因后，接下来需分析作者在这个形象塑造上所使用的技巧，以及该技巧是否成功彰显出李世民虚心纳谏的特点。李世民透过与群臣之间交流谏言谈话内容，提出政治意见和接受意见最终带出虚心纳谏的表现，也就是两者之间有了语言上的交流。语言对人物的的重要性在于个性化的语言能够有效地突出人物形象或内在的性格特点。鲁迅在《看书琐记》里也意识到刻画人物形象不一定非要写出人的模样，而是利用对话的巧思写出每个人“有特色的谈话来”，这样便“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sup>41</sup>，由此可见以个性化语言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是极为重要的表现手段。笔者细读这部小说后，也同样发现了作者在设计世民和群臣的谏谈对话中使用该手法，让李世民的对白流露出他的思想感情和内在性格特点，从而让读者感受到他虚心纳谏的个性和谦逊的形象。

小说里，魏徵可说是李世民身边最敢直言进谏的忠臣了。第五十九回里，魏徵某日又劝谏李世民，“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言。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sup>42</sup>。随后以隋炀帝为例，指出炀帝自恃有才华，自鸣得意，行为上却无法表现出尧舜的善德才导致隋朝消亡。面对魏徵的谏言，他回应道：“炀

---

<sup>41</sup> 鲁迅，《花边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页124。

<sup>42</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2。



帝之事不远，吾当深鉴之”<sup>43</sup>。乍看之下李世民的对白显得简短，并没有过多的情绪变化。然而从年少开始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军事战争和家族间的斗争，他早已练就了沉稳的性子，因此语言上便得显得言简意赅。他虽然和炀帝同样富有才华满腹经纶，却深知自负的下场，因此以“深鉴之”表达了他对魏徵谏言的深深认同和感悟。面对魏徵一次又一次的劝谏，他不嫌枯燥，反而不厌其烦地用心聆听并给予反馈，态度上当真展现了为人或为帝王谦和及虚己的个性。

在这之后，有朝臣禀报李世民某司令史收赃物犯下贪污之罪，他原想判其死罪，这时民部尚书裴矩却站出来与他讲理。裴矩认为犯下贪污之罪虽罪该致死，然而此罪却是他故意设陷阱试探司令史，使司令史拒绝不了诱惑。裴矩便在朝廷上当朝臣面前指出李世民“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sup>44</sup>。裴矩大胆反驳李世民做法的不对，此话此景要是放在隋炀帝身上，恐怕裴矩早已尸骨无存。可李世民听了裴矩的话，却是十分高兴，还昭告群臣，“裴矩能当廷力争，不为面从。倘事事皆如是肯言，何忧不治”<sup>45</sup>。他的虚心受谏，并不只是针对毕恭毕敬提出政见的朝臣，而是希望有忠臣能在他犯错或德行有违明君之道时不保留也不包庇地直接纠正他。正是本身怀抱着如此崇高的君臣相互扶持理念，他才会听到裴矩的质问时即欣慰又欣赏，以此番话当众表扬裴矩的耿直和为君王、为国家着想的心意。语言上写出了李世民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对忠臣犯颜直谏的包容，也代表着该语言契合及完善了世民虚心纳谏的形象。

---

<sup>43</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3。

<sup>44</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4。

<sup>45</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4。

此外，关于人物的个性化语言，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叶菲莫夫就曾说过，要“使作品人物的语言完全适合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口语”<sup>46</sup>。简单来说，就是人物的语言必须符合人物的心理、教养、生活背景和社会地位，唯有人物语言符合人物身份背景和地位，被塑造出来的形象才能更加坚定，避免了形象和语言矛盾的现象同时也能使读者信服。以《唐书志传》为例，在第五十九节中有廷臣讲授《论语》，李世民引《论语》中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sup>47</sup>请教孔颖达。这话的道理在于尽管知识渊博也要向知识较少的人学习，表达不耻下问的谦逊精神。孔颖达为其解释后并劝李世民身为帝王也需以这番道理警戒自身，自作聪明而拒谏只会导向国家消亡。李世民答道：“卿言吾当谨佩”<sup>48</sup>。从他富有教养的回答来看，他对孔颖达的教诲相当慎重地看待并接纳。后他又接着说，“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sup>49</sup>。顺着孔颖达的劝谏，他开始反思自己，而这番发言正说明了他对于自己身为帝王的身份有很高的自觉。他意识到自己稍有不慎的言行举止皆可影响或颠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同时饱览史书经籍和经历过隋朝没落的他也深刻领悟了前朝的教训。正是处于在上的尊位又披着帝王身份，这样的背景让时刻战战兢兢为国操劳的他感慨地说出这番话，唯恐不三思自诩聪明说出的话或决定连累了无辜的百姓。承受着如此沉重的心思，李世民吐露的语言和感慨可说是极为符合他当下的处境及背景，虚心接纳孔颖达劝谏的同时也道出了帝王的不易。

---

<sup>46</sup> 叶菲莫夫，《论文学作品的语言》，转引自：朱持，〈个性化语言浅论〉，《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4期，页38。

<sup>47</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3。

<sup>48</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3。

<sup>49</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6，页273。

整体而言，作者借用个性化的语言带出李世民性格上的谦逊，虚己的态度以及宽阔的胸怀，强化了他虚心纳谏的形象，而符合李世民身份背景所建立起的语言也让他整体的明君形象更具说服力。不仅如此，他与朝臣语言上的互动还能不经意流露出作为帝王，日常中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酸心情写照。于是，在个性化语言的引导下，塑造出了虚怀若谷同时富有情感的帝王。

## 第四章 反面形象的正面作用

熊大木在《唐书志传》中极为用心地去营造出李世民高尚的形象。不管是战场上交兵展现出的沉稳指挥；朝政上为了国事集思广益；对于兄弟手足的隐忍退让都将李世民体现成一位完美的帝王，满足了读者对于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怀抱的期待和幻想。然而，在某些时候熊大木还是会毫不避讳地穿插一些情节，显露出他在军事政策上的失误或是性格上的缺点，这样的负面描写让李世民完美帝王的形象不再完整。

### 第一节 轻率自负的负面形象

战场上刀剑无眼，将帅做的每个决策都决定着士兵将士的生死和战争的胜负，因此必须时刻三思而后行。小说里虽然李世民大部分时候都以大局为重，但在有些关键时刻还是展现出了他的固执自负导致身边的将士陷入险境。第三十二节《秦王乘夜窥柏壁，敬德部兵救并州》里，李世民欲与宋金刚交战。夜里忽然生计，打算仅带着几位侍卫将和五百精骑接近柏壁关道，窥探宋金刚营寨的情势以拟定进攻之计。柏壁关道与宋金刚营寨十分靠近，地形不利，再加上若是惊动敌军单靠五百骑兵并不足与敌方整个军队对抗。可他不听身边将士

规劝，自负道：“我有诸君相随，更兼五百精骑同往，何惧金刚哉？”<sup>50</sup>，最后果然引来了敌军的注意，经历了一番厮杀。他的草率和考虑不周导致身边的将士生命陷入危险之中，此举实在是显得不够稳重，影响大局。同样的情况在第四十一节《丘行恭单骑救主，段志贤匹马鏖兵》也上演了，李世民在连日交兵后竟然想趁闲暇时围猎，后又越界探王世充寨壁的虚实。果不其然，还是引来了单雄信导致两队交锋。对此他后来才后悔不听徐世勣的劝谏，忏悔并引以为戒。

除了战场上表现出的不够深思熟虑之外，李世民在朝政上也曾因意气用事而酿成无法挽回的过失。在第六十一节《李百药奏出宫女，唐太宗分任廷臣》里，有次李世民派遣祖尚前往交址安抚当地的动乱，祖尚领命后却心生悔意，便称病好辞掉该差事。李世民知晓后派杜如晦再次请祖尚领旨，祖尚再辞。李世民怒了，认为祖尚胆敢反驳皇帝的命令即是行政不严，行政不严也就失了威严，于是一气之下命人斩了祖尚，事后他却又后悔了。魏徵看在眼里，借着引文宣帝虽狂暴却能听从朝臣辩解讲理的道理，间接劝谏李世民。他这下才反省自己斩杀祖尚过于冲动，于是为弥补而召其子孙入官。

再来，李世民再如何公正无私，偶尔难免还是会无法衡量是非和事情的轻重，流露出自己的私心。李世民向来十分宠爱其子魏王李泰，某日得知朝中大臣轻视怠慢李泰，便召集臣子们生气地责问。这时魏徵站出来回应道：“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今遇圣明在上，魏王必无折辱群臣之理”<sup>51</sup>。言下之意，似乎是李泰有辱朝臣在先，接着引隋文帝娇宠放纵其子导致国家大乱为例，劝李世民不可效仿。他听后才恍然领悟自己竟因个人私爱而忘了公义。

<sup>50</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4，页155。

<sup>51</sup>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7，页324。

从上述来看，小说中李世民并非每时每刻都呈现积极正面的形象，当中还是会参杂着负面的一面。例如在战场上的不够稳重，性格上的固执自负使到将士深陷危难之中，还有意气用事和含有私心等等。这样的负面描写或多或少都与小说借鉴了元代历史剧的原因有关。

## 第二节 元代历史剧的影响

演义小说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除了在明代的政治氛围、社会物质基础、史学传统等契机之下逐渐酝酿成型之外，还包括民间大量流行的文学艺术如戏曲、平话、历史剧等为演义小说提供生成养分。学者徐振贵也声明，所有的文学创作者都处在“一个庞大的文艺体系中”，不仅创作者之间会相互影响，作品作为体系中一个构成部件也会“影响他类作品或接受他类作品影响”<sup>52</sup>。熊大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各种来源或渠道获得源源不绝的灵感和素材，并将这些素材与自己的想象力结合，编创出不仅蕴含着历史教育思想，还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唐书志传》。

其中，元代历史剧便是熊大木获得小说创作灵感来源之一。有学者刘雪所作的《论隋唐故事中李世民形象的演变》论文中，曾表示元代历史剧中保留了大量有关世民的隋唐故事，当中还刻画了世民复杂且多样化的形象特征。<sup>53</sup>笔者将这些历史剧中的李世民与《唐书志传》中的李世民对比一番后，发现元代历史剧里尤其是描写战场事迹中，也刻画出了李世民负面的形象，并且描写方式

---

<sup>52</sup> 徐振贵，《中国古代戏剧统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页 875。

<sup>53</sup> 刘雪，《论隋唐故事中李世民形象的演变》（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页 35。

与《唐书志传》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推断出熊大木在塑造李世民形象上对元代历史剧有所借鉴。

例如在元剧《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李世民奉李渊命令取洛阳，来到北邙山安营扎寨。他见这漫山花团锦簇还有流水涓涓便忽然起了到处走走的兴致，尽管李密的金墉城就在不远处，还有袁天罡焦急的规劝，他仍执意道“不可挡吾，决要去看！”<sup>54</sup>。随后又只身一人去偷看打探金墉城，半途被白鹿吸引追赶到李密城下，最后被程咬金等人抓住。此番描写对比《唐书志传》的第三十二节极为相似。不管是他忽起的兴致，毫无危机感地打探敌情，还有总是想着围猎贪玩而导致自身陷入险境，其一意孤行的态度总是为身边的人添麻烦。

同样表现李世民自负心态的描写在《魏徵改诏风云会》中也体现出来。李世民领着十万精兵前去抓拿李密，听说李密就在金墉城里，竟大大咧咧只“领着百十骑人马，与兄弟三将军，观看李密城池，走一遭去”<sup>55</sup>。这样的景象在《唐书志传》中也重现了，尤其是剧中他最后不敌程咬金落荒而逃时懊悔感叹“罢、罢、罢，我悔呵迟了也，当初不听李靖之言，果有今日之危也”<sup>56</sup>。《唐书志传》里李世民不听徐世勣劝谏而导致悲剧发生时也发出类似的忏悔之言，因此可见作者对元代历史剧的内容借鉴是有迹可寻的。

有关其他李世民的负面形象特征，如在《魏徵改诏风云会》里也描写了世民曾卑微祈求秦叔宝饶命，还有《长安城四马投唐》世民十次羞辱李密，展现记仇的一面。基于论文字数有限，此处故不详谈。但这些说明了元代历史剧在

---

<sup>54</sup> [元]无名氏，〈程咬金斧劈老君堂〉，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40。

<sup>55</sup> [元]无名氏，〈魏徵改诏风云会〉，页71。

<sup>56</sup> [元]无名氏，〈魏徵改诏风云会〉，页75。

李世民故事的创作上已不再局限于正史中贤君的形象，而是开放大胆地刻画出自负、轻敌、懦弱等多面的形象特征。有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和艺术背景，熊大木也或多或少地借鉴元代历史剧，然后凭想象力在李世民多样化的面貌上再加以发挥，“将李世民从神坛拉入世俗，从历史形象转化为文学形象”<sup>57</sup>。如此，写李世民贤明中夹杂着我行我素、自私等多样的性格，不但没有降低人物的感染力，反而更显世民帝王的人性化，展现真性情的一面。

### 第三节 反面技法

尽管熊大木袭承了元代历史剧的表现手法带出李世民负面的性格和形象，但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揭露身为帝王的瑕疵之处，而是为了借此反衬他的主要性格和形象，这里就涉及了使用“从反面下手”<sup>58</sup>的人物刻画手法。学者叶朗指出，在塑造性格鲜明和形象立体的人物时除了使用正面描写，还可以透过反面描写来衬托或突出人物主要性格，因为“一个人在同他的性格相矛盾的行为中，往往反而更能表现他的性格”<sup>59</sup>。同时唯有灵活地运用多样化的、多变的人物性格表现形式，才能使人物“呈现出浓烈的色调和丰富的层次”<sup>60</sup>。

运用反面手法刻画人物最成功与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水浒传》里写李逵下枯井寻找柴进那一幕。由于李逵在这之前曾被戴宗使神行法戏弄，因此李逵在下井前开玩笑般让宋江等人这次可别割断了绳索。这里看似写出李逵的奸猾和

---

<sup>57</sup> 刘雪，《论隋唐故事中李世民形象的演变》，页 113。

<sup>58</sup>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页 98。

<sup>59</sup>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页 99。

<sup>60</sup>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页 99。



小心眼，与他朴实的主要性格不符。恰好相反的是，按当下情急找人的氛围来说，宋江等人怎可能还有心思捉弄李逵，李逵不懂得观察场合和氛围的轻重直率地说出这番话，反而突显他毫无心思的憨傻，所以金圣叹力赞这样的反写手法，认为“写得李逵越奸猾，便越朴至，真奇事也”<sup>61</sup>。

同样的道理，作者在第一节中列举出的李世民负面形象和性格上的缺点都是为了通过反写烘托回他的主要性格，那就是虚心纳谏。从第一节的例子来看，不管是在战场上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果，与朝臣政见的冲突还是被私心影响的判断，最终李世民都会在领会朝臣的分析劝谏后忏悔自己的错误。他不仅懂得反省检讨自身的问题，还愿意为此做出改变和弥补，并借他人之言警戒自己，让自己避免重蹈覆辙。相较起全书正写李世民虚心受谏，偶尔利用反写他犯错后通过群臣劝谏反省自己，更能让读者对他虚心受谏的性格有更多的感受及留下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唐书志传》的编创是在参照史书如《旧唐书》之下完成。虽然《唐书志传》与《旧唐书》对李世民的描写目的都是为了宣扬李世民的正统性，然而这样的反面描写手法却是《旧唐书》中所没有的。或许是史书撰写必须抱着严谨态度，因此李世民纳谏的记载都只有正面描写，例如“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施行”<sup>62</sup>和“诏以灾命百官上封事，极言得失”<sup>63</sup>。其中有关李世民的负面描写几乎少之又少，就连备受争议的玄武门之变也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sup>64</sup>来维护李世民，表示此为他不得已之举。反观《唐书志传》，作者不仅正写，还利用多元表现形式如反写负面形象衬托回李世民

<sup>61</sup> 金圣叹著，陆林辑校，《金圣叹全集（四）》，页 968。

<sup>62</sup>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 40。

<sup>63</sup> [后晋]刘昫，《旧唐书》，页 48。

<sup>64</sup> [后晋]刘昫，《旧唐书》，页 63。

纳谏的主要形象。这不过是因为作者意识到人物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的差别在于后者应融合适当性的虚构和艺术想象力，因此说道：“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sup>65</sup>。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对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虚构成分持否认态度，像是明人修髯子就主张其必须“羽翼信史而不违”<sup>66</sup>。在笔者的观点看来，《唐书志传》虽是敷演历史阐发义理，但本质上却还是小说，属于文学创作的作品，应该允许小说在不违背历史大框架的情况下，让作者发挥其艺术的创造力。通过结合层次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塑造多元却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才有了值得鉴赏的艺术价值。正如钱锺书先生所持的文学创作理论，认为文学作品不该以考据的角度来衡量，因为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挖掘“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sup>67</sup>，否则就丧失了艺术的职责，“抛弃了它的创造力的职权”<sup>68</sup>。

言归小说，反写除了能够烘托回李世民虚心纳谏的主要性格之外，还可以借此以另一个角度分他负面形象带给读者的感受。尽管李世民在小说中被神化成龙，但作为人间帝王的他也不过是凡人之躯，也有七情六欲，私心私欲，甚至和普通百姓一样会犯错。恰好是这样的他，却能凭着强大的意志力和毅力时刻确保自己的个人私情不影响国家大局，以他人为明镜检讨自己。正是这份为了天下太平而端正自己的心意，更突显了李世民的伟大。李世民卸去了完美帝王的包装，反而勾勒出一位有血有肉的、富有感情的、爱民的帝王。

---

<sup>65</sup> [明]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页123。

<sup>66</sup> [明]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节录）〉，页115。

<sup>67</sup> 钱钟书，《宋诗选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页7。

<sup>68</sup> 钱钟书，《宋诗选注》，页7。

总之，作者在小说中突破了历史形象的牢笼，灵活运用了反写的人物刻画手法带出李世民负面形象和性格缺点，反而突显了他虚心纳谏的主要性格和形象。不仅如此，反写李世民的缺点还能够巧妙地体现出他的爱民思想，帝王高高在上的距离感淡化了，形象变得平易近人的同时更能打动读者的心。

## 第五章 结语

总结上述，笔者透过对《唐书志传》中李世民的形像研究，发掘了这部演义小说的文学鉴赏价值和艺术魅力。尽管作者继承了史官笔法将李世民神化成“龙的化身”，但描写李世民一身龙泽充沛蕴含山川之气，还有若隐若现的蛟龙眼冒红光腾云驾雾等等细致的特征，正好为小说增添了玄幻又浪漫的气息，柔和了冗长史事的枯燥乏味。作者也并非随意夸大李世民的神化形像，而是根据情节需求展现李世民合乎情理的心理活动和情绪高低起伏，在惊险刺激的情节里突现李世民的一惊一乍，在该展现李世民英勇一面时又显现出其龙身的神威。每处情境中人物内心、举止细节和形像刻画方式等都是作者巧思的体现，让读者在阅读时发挥想象力，获得感官的刺激和精神上的享受。

此外，作者为了宣扬小说中劝世教化的实用价值重点突出了李世民虚心纳谏的美好形像，利用李世民纳谏如流的举动彰显出历史上的中国帝王少有的谦逊低调，气度非凡和宽阔胸怀，打动读者并效仿其抑恶扬善的思想。其中，再配合着符合李世民谦逊性格的个性化语言，让李世民的每次发言谈吐都流露出他对忠臣规谏的尊重和宽容接纳之心，更好地塑造了虚心纳谏的鲜明形像。透过个性化的语言揭露李世民身为帝王如履薄冰的心情写照，让读者从李世民的言语感受其内心世界的变化，还可以加强读者对李世民这个人物的审美感受，让读者在李世民的感慨发言下也为之动容。

不仅如此，作者还借鉴了元代历史剧里李世民负面形象和性格缺点的描写方式，在《唐书志传》中建构出李世民有如自负、轻敌、自私等负面形象。这一系列形象跳脱了历史形象中对李世民正面形象的既定框架，不仅利用史书惯用的正写手法刻画李世民正面形象，也用反写手法塑造其负面形象，最后再以李世民忏悔自己所作所为，反衬其虚心纳谏的主要正面形象。由此可见，作者在李世民的形像建构上运用了多重表现形式使人物呈现丰富的层次感，李世民的形象也变得更加立体和人性化，具有记忆点。

凭着以上列出的特点，我们可以总结相较起李世民的歷史形像，其文学形像更多地呈现出不同面貌，有着史书上的李世民所无法取代和媲美的审美意趣。

《旧唐书》写出了李世民的政事和军事上的运筹帷幄，但表现手法较为单一，像是前文提及的只有正写手法；《新唐书》文字简略，“但人物语言、情态已大失韵味”<sup>69</sup>。反观《唐书志传》虽参照史书，但作者却在书中贯穿一套自己的创作手法，那就是明代作家谢肇淛所谓的“情景造极而止”<sup>70</sup>的艺术虚构法则，亦就是在不变动历史大框架下对人事物作细节调整和用想象力再创造，从而实现艺术的真实。《唐书志传》确实做到了建构出李世民的藝術形像，让明代文学家陈继儒读后“啧啧叹之”<sup>71</sup>，还有书中文雅诗词也“使俗人骚客披之自亦得诸欢慕”<sup>72</sup>，最终成为明代畅销之作。

---

<sup>69</sup> 彭知辉，〈论正史与历史演义小说：以隋唐题材为例〉，《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页67。

<sup>70</sup> 蔡景康，〈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学术研究》1991年第5期，页104。

<sup>71</sup> [明]陈继儒，〈唐书演义序〉，页138。

<sup>72</sup> [明]李大年，〈唐书演义序〉，页124。

## 引用书目

### (一) 书籍

[后晋]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

[明] 施耐庵著，王利器校注，《水浒全传校注（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明] 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陈洪，《中小说理论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遵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纪德君，《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金圣叹著，陆林辑校，《金圣叹全集（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金圣叹著，陆林辑校，《金圣叹全集（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李保均，《明清小说比较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4。

鲁迅，《花边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钱锺书，《宋诗选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

王先霭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

徐振贵，《中国古代戏剧统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台北：里仁书局，1987。

## （二）专章

[元] 无名氏，〈程咬金斧劈老君堂〉，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八卷）》，页 33-5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元] 无名氏，〈魏徵改诏风云会〉，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八卷）》，页 60-9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明] 陈继儒，〈唐书演义序〉，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页 138-140。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明] 李大年,〈唐书演义序〉,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页 124-125。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明]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节录)〉,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页 115-116。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明] 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页 121-123。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明]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页 108-112。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三) 期刊论文

蔡景康,〈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学术研究》1991 年第 5 期,页 100-105。

刘平、孙旭红,〈论先秦史官与神化历史化〉,《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6 期,页 80-83。

罗陈霞,〈《唐书志传》《两朝志传》的史传倾向分析〉,《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页 10-14。

彭知辉,〈论正史与历史演义小说:以隋唐题材为例〉,《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页 66-69。



朱持，〈个性化语言浅论〉，《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4期，页35-45。

#### （四）学位论文

刘雪，《论隋唐故事中李世民形象的演变》，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曾雪丽，《熊大木的小说创作与小说观念研究》，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张兴国，《明代书坊主熊大木\_余象斗小说创作比较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论文，2012。